

全球结构矛盾加剧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

潘英丽，何知仁^①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近中期冲击和结构矛盾的长期困扰。随着后疫情时期经济秩序的正常化，全球结构矛盾的中长期影响将更为凸现，中国产业转型面临着更为紧迫的要求和更大压力。本文首先简述气候变化、贫富极度分化和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等全球结构矛盾及国际社会的应对之策，然后探索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结构矛盾及其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最后提出关于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结构矛盾；中美再平衡；中国产业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人均收入仅为美国 2.1%、人口为全球 22% 的劳动力成本的巨型“洼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政府还以税收优惠、廉价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吸引外资。随着跨国企业及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和扩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进以破除一个又一个发展瓶颈，内部经济的动力、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持续提升，经济高速增长自然也水到渠成。特别是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关停并转所导致的不稳定增长在以外部市场弥补内需不足后转化为出口拉动的加速增长。但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大停滞初露端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徐徐展开。这种变局表现为战后国际体系的失序与分化，中美难以调解的大国博弈，同时也表现为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战略机遇期的时间之窗事实上已经关闭。

全球大变局是全球长期结构矛盾持续积累和恶化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的近中期冲击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2022 年 2 月以来的俄乌冲突及美西方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和私人海外资产的联合制裁，给高度依赖美元体系和西方市场的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中国经济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和惯性前行。中国产业转型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最为紧迫的重中之重。

【作者简介】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学、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应急项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财政部委托课题、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20 余项。

何知仁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为此，本文第一部分从国际公认的全球结构矛盾入手阐述气候变化、贫富极度分化和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等结构矛盾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第二部分提出并探索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结构矛盾，如全球因广义制度差异带来跨境生产要素组合的困难，全球消费市场结构的不平衡和再平衡，中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和再平衡问题，以及这些新型结构矛盾对中国的长期不利影响。第三部分对我国经济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内循环为主体”所要求的产业转型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可供选择的相关政策建议。

1 国际公认的全球结构矛盾

2020年初，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邀请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让·蒂罗尔（Jean Tirole）牵头组建了由26位国际一流经济学家构成的顾问委员会，并经共同研讨后于2021年6月完成了444页的《未来的主要经济挑战》报告（俗称“马克龙报告”）^①。报告围绕气候变化、不平等和老龄化三大挑战，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体解决方案。针对报告仅限于分析法国问题，本小节在补充全球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简述其主要研究成果，以供各界推进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时参考。

1.1 气候变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地球正在变暖，并且与人为因素有关。对此，国际社会已有共识。日益紧迫的气候问题要求国际社会迅速开展大规模应对行动，但是人们不愿意接受此类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虽然气候变化对人类而言已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而对抗气候变暖的行动也会带来结构性影响：存在发展成本的代际分配，高碳与低碳行业间的消长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得与失问题。因此，整体解决方案需要考虑分配效应、民众的信任和可接受度等复杂因素。为此专家们提出了由五个支柱构成的整体解决方案。

支柱1：碳价格。尽管具有惩罚和累退性质的碳税不受欢迎，但设定一定水平的碳价格仍然是绝对必要并且有效的，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设定碳价格的优点是鼓励以较低成本消除污染；促进绿色创新；仅需对排放进行测量，简便易行，可减少行政裁量权，让市场发挥更大调节作用。把碳价格搞对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未来要让碳价格进入私人长期投资函数。建议是为碳排放价格设定上下限，保持碳价格相对稳定，并且每年以稳定的速率提高；创立一家独立的碳理事会（或将之命名为碳中央银行）以负责价格的调整。碳价格还必须具有普遍性，以避免高碳活动的海外环境倾销这种漏洞，为此建议实施碳边境税调整。

^①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by Olivier Blanchard and Jean Tirole. Major Future Economic Challenges[R/OL]. (2021-06-23) [2022-01-25].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stantcheva/files/rodrik_and_stantcheva_report_for_macron_commission.pdf.

支柱 2：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促进研发：一是为民营企业设定可实现的技术目标；二是设立相关研发部门，为私人 and 公共部门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以解决绿色技术领域的关键挑战。

支柱 3：补充行动。碳价格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政治因素致碳价过低；部分领域排放测量存在困难；统一技术标准以及政府在选择上保持中性相对困难；碳价格对消费者长远投资的指导作用相对较弱。因此，需要在碳价格之外采取补充措施，如实施禁令或更普遍的标准，包括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禁止在特定日期后停止生产或销售使用某种燃料的汽车，设立不允许采用化石燃料的汽车驶入的低排放区等等。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有 25%来自农业，16%是具有强烈温室效应的甲烷，因此，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农业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但除了一般降碳政策外，还可采取哪些更有效的农业降碳政策尚不明确。另外，需要实施建筑、城市规划与公共交通设计等城市绿色战略，并辅以房地产税或资本利得税让社区分享城市土地升值等协同效益。

支柱 4：补偿。补偿并非针对所有受损者。劳动者应得到补偿，股东则没有资格，原因是为搁浅资产提供补偿反而会削弱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积极性。另外需要采取后顾型而非前瞻型补偿，也即应补偿受损者支付的成本，而不是让补偿成为经常性收入。

支柱 5：国际合作。实施碳排放边境调节机制，以边境税消除企业处于环境监管不力的国家中的竞争优势（此政策对中国高碳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冲击）。鼓励对绿色技术的公共投入，向贫困国家提供技术成果，并向其展示现有技术的可行性。

1.2 经济不平等及其应对

瑞信银行《2021 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全球成年人中占比 1.1%、财富超过 100 万美元的群体，拥有的财富总额达到全球的 45.8%，而财富小于 1 万美元的成年人占比 56%，财富总额占比仅为 1.3%。10 个代表性国家在 2000—2020 年间的财富不平等数据如表 1 所示。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与 2000 年相比都是恶化的。从 1%顶层富人的财富占比看，俄罗斯、巴西和印度排名前三，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①。

表 1 部分国家 2000—2020 年间财富不平等趋势（单位：%）

1%最高净值人群拥有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比	
基尼系数	例

^① Anthony Shorrocks, James Davies, Rodrigo Lluber.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 [R/OL]. (2021-07-01) [2022-01-25].<https://www.credit-suisse.com/media/assets/corporate/docs/about-us/research/publications/global-wealth-databook-2021.pdf>.

	2000	2005	2010	2015	2019	2020	2000	2005	2010	2015	2019	2020
巴西	84.7	82.8	82.2	88.7	88.2	89.0	44.2	45.1	40.5	48.6	46.9	49.6
中国	59.9	63.6	69.8	71.1	69.7	70.4	20.9	24.3	31.4	31.5	29.0	30.6
法国	69.7	67.0	69.9	70.0	69.9	70.0	25.7	21.1	21.1	22.5	22.4	22.1
德国	81.2	82.7	77.5	79.3	77.9	77.9	29.3	30.5	25.9	32.3	29.4	29.1
印度	74.7	81.0	82.1	83.3	82.0	82.3	33.5	42.2	41.6	42.5	39.5	40.5
意大利	60.1	59.5	63.0	67.1	66.4	66.5	22.1	18.3	17.3	22.8	21.8	22.2
日本	64.7	63.2	62.5	63.5	64.2	64.4	20.6	19.1	16.9	18.2	17.8	18.2
俄罗斯	84.7	87.2	90.0	89.5	87.3	87.8	54.3	60.3	62.6	63.0	57.1	58.2
英国	70.7	67.7	69.2	73.1	71.4	71.7	22.5	20.8	23.8	25.2	22.4	23.1
美国	80.6	81.1	84.0	84.9	85.1	85.0	32.8	32.7	33.3	34.9	35.0	35.3

数据来源：瑞信银行《2021 全球财富报告》。

由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人撰写的《2022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对全球不平等现状做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考察，其揭示的全球贫富分化程度与瑞信的分析较为接近^①。图 1 给出了 2021 年全球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级分化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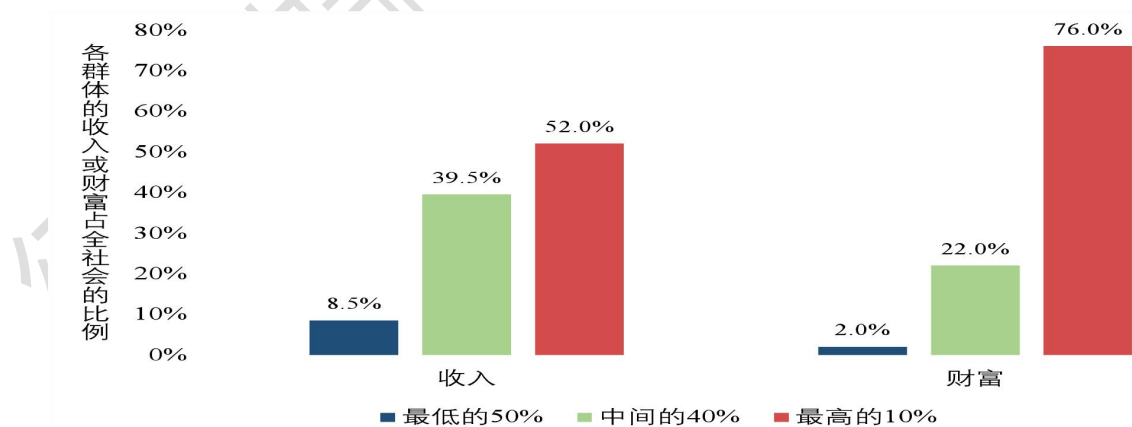


图 1：2021 年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现状

数据来源：《2022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

^①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R/OL]. (2021-12-12) [2022-01-25]. https://www.cadtm.org/IMG/pdf/summary_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_english.pdf.

从地区来看，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秘鲁、智利，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和非洲南部的南非等国 10%顶部人群的财富占比在 72%~86%之间，50%的底部群体的财富占比则低于 1.8%，并且还有很多属于负资产群体。从顶部 10%人群相对底部 50%人群的财富倍数来看，中东、南非和拉美国家的财富分化最为严重，美国次之，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北非以及阿根廷再次之，欧洲、澳洲和日本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

另外，除了收入和财富差距外，人们还担忧社会流动性，关注子女的出路，认为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极为不平等的。贫富极度分化必然抑制最终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动能，造成经济低迷，慢性萧条风险上升，甚至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全球不平等挑战已是各国必须应对的棘手问题。

“马克龙报告”的专家们提出在生产前、生产后和生产过程中缓解不平等的政策。

（1）生产前阶段促进公平竞争环境。具体政策：一是缓解教育的不平等。减少学校分隔，为弱势学生群体增加投入；鼓励企业招收学徒工，鼓励学生成为学徒，大力增强职业培训与岗位的联系；增加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二是完善与财产继承相关的制度。遗产税（而非财产税）的意图是让后代人有更平等的财务竞争基础。但财富代际转移占年度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正在上升（法国目前为 19%，2050 年可能达 25%~32%）。报告建议，遗产税需以受益人的所得作为税基；并通过打破公共财政原则，明确将遗产税收入用于促进机会平等的资金再分配。

（2）生产后阶段实施税收干预。所得税征收面临的挑战是资本流动性比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得多。对资本的征税导致资本外逃，而技术的运用可提升征税效率，如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可增加税收收入并提高公平程度，不让老实人吃亏。强化国际税收自动信息交换，达成最低税率国际协定以避免逐底竞争（近 140 个国家就全球 15%最低企业税达成协议）。另外就是填补影响税制效率与公平的各种漏洞，并且对外国人也应一视同仁。

（3）生产阶段推进技能与技术的相互适应。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替代劳动，造成低技能就业岗位和只需重复操作的中等技能岗位的消失。但是技术也可以成为劳动的补充，让低技能劳动者完成更复杂的工作，让中等技能劳动者完成高技能任务。因此，就有两类政策可以采用。一是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劳动者适应岗位的需求。设计得当的行业培训项目，且与企业的合作越紧密，培训效果就越好；创设个人培训账户，由政府提供补贴，采取拨款或减免用于培训的贷款的形式。根据企业提供的培训资质减免企业的社保缴费。创建负责职业培训的协调、资助和认证的新体系以提供组织保障。二是引导企业开发和应用劳动互补型技术，创造更多优质劳动岗位。可运用“就业前景测试”决定公共资金对创新项目

支持的优先等级。对摧毁就业岗位的设备和创新则应取消补贴并予以征税，从而让企业更多关注其投资和研发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

1.3 老龄化的应对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给社会带来养老负担。对实施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而言^①，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要么降低养老金待遇，要么增加缴费或提高退休年龄。“马克龙报告”的专家们则建议将提高退休年龄与减少（法国高标准）养老金相结合。

首先，需对现行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引入整体解决方法。①将养老金缴费与工资指数挂钩，并参考人口抚养比，运用更透明、更易预测和更为公平的调整方法来实现财务平衡。②引入一套简单易懂的积分体系。在职业生涯中，劳动者得到的积分需由个人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加权，从而保证其早期收入同后期收入具有同样的社会相对价值。积分在个人账户中逐渐积累，跨越整个职业生涯，直至个人开始领取养老金。累积的积分将换算为初始养老金数额，与当年的社会平均养老金数额成比例。应根据工资通胀率和人口结构变化调整积分的货币价值，给付水平的增幅应等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扣减抚养比变化后的部分。积分体系应承认个体差异，并给失业期、孕产期和终生收入较低人群提供额外积分，给收入分配处于底层 40% 的人群提供额外积分。③设定最早退休的时间窗口，并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推迟。根据职业期限约为退休期限的两倍，预期寿命如果增加 3 年，那么其中两年应该工作，也即退休年龄应推迟 2 年，退休期则增加一年。

其次，需要采取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者不仅因就业而获得收入，而且因与职场保持联系而获得生活的目标感。①要让延长工作年限的调整能保持养老金的精算中性，以增加吸引力。②需加强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培训，瑞典正式教育结束后接受再教育的职工比例高达 72%。③需改进预防措施和职场环境，以提高慢性病患者继续工作的能力和可能性。

2 需要重视并继续观察的全球结构矛盾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已加深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本文在生产要素三分法基础上引入广义制度的生产要素属性。包括宗教文化、社会习俗在内的无形制度与有形制度作为一国社会资本，是基础性生产要素的黏合剂和生产效率的催化剂。基础生产要素的地区

^① 中国曾试点个人缴费形成“个人账户”，以“基金积累制”应对未来自身养老所需。向积累制转换将造成当代劳动者双重不幸，他们既要负担数量巨大的上一代人的养老金，又要负担自己的一部分养老金，而且就业稳定性也在下降。至 2020 年全国做实个人账户的省市基金总额 4154 亿元，按 3.2 亿缴费职工计算，每人近 20 年来才积累了 1300 元。个人账户做法已然失败，未来不再做实，并把个人账户的金额放入统筹账户。

分布不平衡和社会资本差异已经造成跨境要素有效组合的困难。

2.1 全球生产要素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与跨境要素组合的困难

1) 劳动力资源的地区不平衡

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亚洲地区的总人口超过全球的 50%。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 2050 年将占到全球人口的 22%^①。从年龄结构来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进步的悖论》报告（2017 年发布）预测，2015—2035 年间 15 岁到 64 岁的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受教育年限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大量增加；热带地区低收入国家医疗卫生条件差、非正常死亡率高，导致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15~20 岁之间^②。这些年龄中位数低的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有教育与经验积累的人力资本匮乏，文化与制度环境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未来将面临严重的年轻人失业问题。东亚与欧洲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稀缺、老年赡养负担上升等问题，其本地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将面临持续下滑的状况。

2) 资本积累的地区不平衡

由于全球资本技术积累的地区分布缺乏直接数据，本文以全球家庭财富数据作为替代指标。尽管这些数据或多或少地含有资产泡沫成分，但家庭财富积累与一国生产性资本技术的积累具有正相关关系，可大致反映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积累水平。瑞信银行《2021 全球财富报告》给出 21 世纪以来家庭财富地区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截至 2020 年底，实物资产加金融资产再减去债务的全球家庭财富净额达到 418.34 万亿美元。财富的地区分布是北美占 32.58%，欧洲占 24.67%，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占 17.99%，中国占比 17.90%，印度占 3.07%，此外拉美和非洲分别仅占 2.60%和 1.18%（见瑞信银行《2021 全球财富报告》）。发达国家在中高端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有更多资本积累；中国则在基础设施硬件和中低端制造业有更多资本和技术积累。

^① 经济权重日益下降 发达世界失去的七个优势[EB/OL]. (2017-07-28)
[2022-01-25].<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4n01>.

^②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Paradox of Progress[R].USA: NIC,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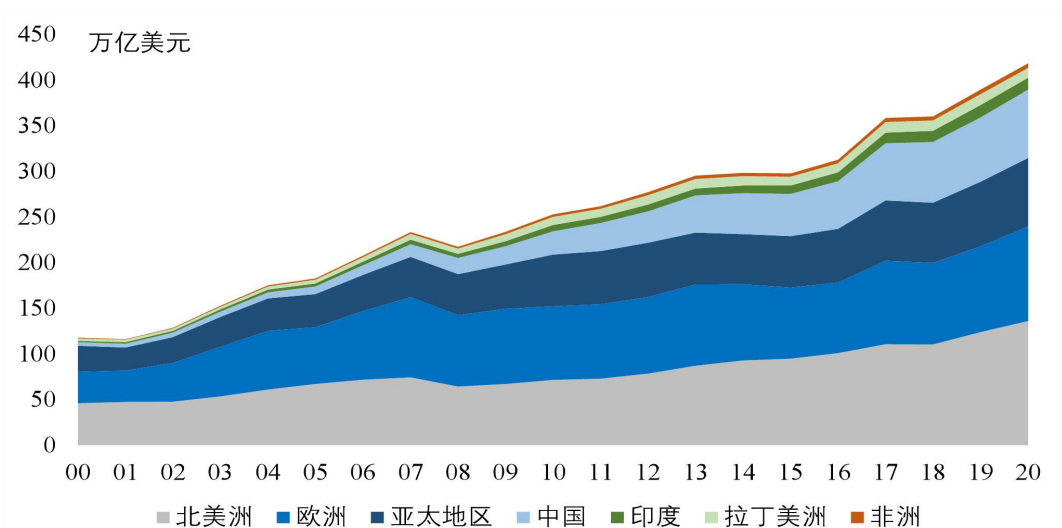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0 年全球家庭财富的地区分布及其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瑞信银行《2021 全球财富报告》。

3) 全球要素组合面临文明冲突的挑战

全球范围内基本生产要素的组合有两种模式：跨境投资，资本流向年轻劳动力富裕的地区；移民政策，年轻劳动力流向人口老龄化国家。

本文认为，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发达国家移民政策通常有技术或资本门槛，并且会对人才流失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而难民的涌入更易给发达国家带来财政压力、社会动荡和主场文明冲突的长期后遗症。

相比较，跨境投资过去是，未来仍然是全球生产要素组合的主要模式。其面临的挑战是东道国国家风险，包括债务违约和核心生产要素的稀缺造成的投资失败。其背后是不利的广义制度环境。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曾以“华盛顿共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制度，但大都以失败告终。旧体制上很难建立新制度，或导致两种制度缺陷的叠加，致使“南北”之间的直接投资迅速衰减，更多资本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流动或以热钱的方式在全球流转。非洲经济失去了 50 年，而众多拉美国家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的“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先后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也带来多重结构矛盾。

(1) 美国陷入“全球化陷阱”^[1]。一是制造业外包造成了本土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的增加。美国在 21 世纪前十年，在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失业和低收入家庭转移支付要求增加了政府财政压力^[2]。二是增加了联邦政府外交和军费开支以维护本国海外经济利益。三是境外投资收益不给母国纳税，造成税基流失。全球化由此导致了收益为私人集团获取、成本由联邦政府承担的国家与跨国集团间的利益冲突。

Gomory 等人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某个国家的利益与该国企业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美国需要新的经济策略把企业和国家的目标统一起来，以反映全球化世界的现实需要^[3]。

(2) 欧洲面临资本输出和劳动力输入的双重压力。制造业外移会减少就业岗位，而东欧国家移民的流入则挤占了非贸易产业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造成了主权国家内部社会冲突的激化。欧洲面临内部市场相对萎缩、财政难以持续、难民危机与宗教文化冲突等多重复杂问题。

(3) “世界工厂”中国面临产业结构与内部市场需求结构的错配以及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中国重资产行业存在低水平重复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过剩产能的去化又面临出口受阻、对外投资风险和内部债务违约等多重困难。非贸易产业如消费服务业发展滞后，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等方面存在供给短缺。

2.2 全球消费市场结构的不平衡和再平衡

G7 国家人口、消费和 GDP 的全球占比如表 2 所示。美国 2000 年人口的全球占比为 4.61%，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 32.19%。2020 年人口占比为 4.25%，消费占比仍高达 27.95%。长年以来，美国以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全球人才的流入。但美国也是 2020 年 G7 中唯一一个消费占比能超过 GDP 占比 3 个百分点以上的赤字国家，这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属性密切相关。其他六国在 2020 年也同为赤字，但所超占比都低于 1 个百分点。从趋势看，从 2000 至 2019 年 G7 国家 GDP 全球占比合计减少了 20 个百分点。人口占比减了 1.41 个百分点，消费占比减了 17.43 个百分点。十分明确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和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持续下降。未来人口占比小幅下降，消费及 GDP 占比大幅下降仍然是相对确定的趋势。这从市场容量上抑制了中国对欧美出口的空间，也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仍将持续紧张。

表 2 G7 国家人口、消费和 GDP 的全球占比（1970—2020 年）

单位：%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美国	人口占比	5.57	5.13	4.73	4.61	4.47	4.37	4.35	4.33	4.30	4.25
	消费占比	37.87	26.16	27.79	32.19	25.89	27.00	27.34	26.94	27.33	27.95
	GDP占比	35.96	25.31	26.22	30.42	22.66	24.31	24.59	24.09	23.93	24.75
日本	人口占比	2.81	2.63	2.34	2.07	1.85	1.73	1.71	1.69	1.67	1.62
	消费占比	5.54	8.79	11.84	13.69	8.88	6.08	6.63	6.16	5.99	6.01
	GDP占比	7.12	9.79	13.78	14.74	8.70	5.92	6.56	6.08	5.85	5.88
德国	人口占比	2.12	1.77	1.50	1.34	1.18	1.11	1.11	1.10	1.09	1.07
	消费占比	7.00	8.99	7.81	5.74	5.14	4.43	4.49	4.47	4.57	4.41
	GDP占比	7.23	8.42	7.79	5.77	5.13	4.47	4.55	4.54	4.62	4.45
法国	人口占比	1.41	1.24	1.10	1.00	0.94	0.91	0.90	0.89	0.88	0.87
	消费占比	4.77	6.31	5.66	4.07	4.25	3.45	3.43	3.39	3.44	3.28
	GDP占比	4.97	6.21	5.58	4.04	3.99	3.25	3.24	3.19	3.24	3.11
英国	人口占比	1.51	1.27	1.08	0.96	0.91	0.89	0.88	0.88	0.88	0.87
	消费占比	4.95	5.78	5.45	5.42	4.31	4.46	4.03	3.74	3.80	3.69
	GDP占比	4.38	5.00	4.81	4.92	3.75	3.91	3.53	3.28	3.32	3.24
意大利	人口占比	1.46	1.27	1.07	0.93	0.86	0.83	0.82	0.81	0.80	0.78
	消费占比	3.78	4.31	5.34	3.51	3.52	2.66	2.64	2.61	2.64	2.48
	GDP占比	3.80	4.23	5.19	3.39	3.23	2.45	2.46	2.41	2.43	2.29
加拿大	人口占比	0.58	0.55	0.52	0.50	0.49	0.49	0.49	0.49	0.49	0.49
	消费占比	3.08	2.45	2.73	2.15	2.57	2.22	2.16	2.19	2.17	2.15
	GDP占比	2.94	2.43	2.61	2.21	2.44	2.07	2.00	2.03	2.00	1.99
G7合计	人口占比	15.46	13.87	12.36	11.43	10.69	10.32	10.26	10.18	10.11	10.02
	消费占比	66.99	62.79	66.62	66.77	54.56	50.30	50.72	49.50	49.45	49.34
	GDP占比	66.41	61.39	65.98	65.49	49.91	46.39	46.94	45.63	45.37	45.4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12 个人口 1 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的相关数据如表 3 所示。这 12 个国家 2020 年人口总规模的全球占比达 57.53%，当年消费仅占 24.99%。从 2000 年以来的趋势看，中国消费占比从 2000 年的 3.02% 增长到 2020 年的 13.17%，增加了约 3.36 倍。亚洲国家消费占比都有增长，除巴基斯坦外也达到了翻番。相比较，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占比不变或下降，消费占比近年来皆呈下降态势。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消费占比处在上升期；埃及 GDP 和消费占比波动较大。可见，发展中大国的消费占比与人口占比相比，上升的潜力更大。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2020 年三国人口、GDP 和消费的全球占比分别为 39.42%、21.76% 和 17.42%。中国的消费占比与 GDP 占比相比低了 4.24 个百分点，消费受抑制最为严重。这与快速的贫富分化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有很大关系。

总之，全球消费市场的地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重心已从欧美转向亚洲。但是中国等亚洲人口大国亟待通过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去释放其消费市场潜力。

表 3 12 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消费和 GDP 的全球占比（1970—2020 年）

单位：%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	人口占比	22.22	22.13	21.50	20.65	19.33	18.68	18.57	18.46	18.34	18.22	18.09
	消费占比	2.67	1.47	1.34	3.02	6.04	10.84	11.01	11.40	12.23	12.56	13.17
	GDP占比	3.10	1.69	1.59	3.59	9.20	14.74	14.74	15.18	16.13	16.33	17.41
印度	人口占比	15.08	15.77	16.54	17.28	17.83	17.85	17.84	17.83	17.82	17.81	17.80
	消费占比	2.50	1.93	1.47	1.39	2.23	2.65	2.84	3.11	3.03	3.23	3.07
	GDP占比	2.09	1.65	1.41	1.39	2.53	2.80	3.01	3.27	3.14	3.28	3.10
印度尼西亚	人口占比	3.12	3.33	3.44	3.46	3.49	3.52	3.52	3.52	3.53	3.53	3.53
	消费占比	0.37	0.61	0.45	0.44	1.00	1.05	1.12	1.14	1.10	1.17	1.18
	GDP占比	0.31	0.64	0.47	0.49	1.14	1.15	1.22	1.25	1.21	1.28	1.25
巴基斯坦	人口占比	1.58	1.76	2.04	2.33	2.59	2.72	2.74	2.77	2.80	2.82	2.85
	消费占比	0.39	0.26	0.20	0.27	0.32	0.45	0.45	0.48	0.47	0.41	0.39
	GDP占比	0.34	0.21	0.18	0.24	0.27	0.36	0.37	0.38	0.37	0.32	0.31
巴西	人口占比	2.58	2.72	2.82	2.86	2.83	2.79	2.78	2.77	2.76	2.75	2.74
	消费占比	1.53	2.20	2.12	2.14	3.55	2.74	2.71	2.95	2.59	2.50	1.96
	GDP占比	1.42	2.08	2.03	1.94	3.34	2.40	2.36	2.54	2.23	2.15	1.71
尼日利亚	人口占比	1.52	1.66	1.80	2.00	2.29	2.47	2.50	2.54	2.58	2.62	2.66
	消费占比			0.11	0.12	0.56	0.75	0.63	0.54	0.52	0.56	0.55
	GDP占比	0.42	0.57	0.24	0.21	0.55	0.65	0.53	0.46	0.46	0.51	0.51
孟加拉国	人口占比	1.74	1.80	1.95	2.09	2.13	2.13	2.13	2.13	2.13	2.12	2.12
	消费占比	0.38	0.21	0.16	0.17	0.19	0.28	0.30	0.31	0.34	0.36	0.40
	GDP占比	0.30	0.16	0.14	0.16	0.17	0.26	0.29	0.31	0.32	0.35	0.38
俄罗斯	人口占比	3.54	3.14	2.80	2.40	2.06	1.96	1.94	1.92	1.90	1.88	1.86
	消费占比			2.10	0.62	2.17	1.74	1.63	1.89	1.80	1.84	1.70
	GDP占比			2.27	0.77	2.30	1.82	1.67	1.94	1.92	1.93	1.75
墨西哥	人口占比	1.40	1.53	1.59	1.62	1.65	1.66	1.66	1.66	1.66	1.66	1.66
	消费占比	1.27	1.73	1.20	2.15	1.65	1.65	1.49	1.50	1.49	1.52	1.34
	GDP占比	1.19	1.82	1.15	2.10	1.60	1.56	1.41	1.43	1.42	1.45	1.27
埃塞俄比亚	人口占比	0.77	0.79	0.91	1.08	1.27	1.37	1.40	1.42	1.44	1.46	1.48
	消费占比						0.09	0.10	0.11	0.10	0.12	0.14
	GDP占比			0.05	0.02	0.05	0.09	0.10	0.10	0.10	0.11	0.13
菲律宾	人口占比	0.97	1.07	1.17	1.28	1.36	1.39	1.40	1.40	1.40	1.41	1.41
	消费占比	0.23	0.28	0.21	0.27	0.34	0.46	0.48	0.46	0.47	0.51	0.53
	GDP占比	0.22	0.29	0.19	0.25	0.31	0.41	0.42	0.40	0.40	0.43	0.43
埃及	人口占比	0.94	0.98	1.06	1.13	1.20	1.26	1.27	1.28	1.30	1.31	1.32
	消费占比	0.32	0.22	0.21	0.34	0.38	0.56	0.56	0.39	0.37	0.43	0.56
	GDP占比	0.27	0.19	0.19	0.30	0.33	0.44	0.44	0.29	0.29	0.35	0.43
12国加总	人口占比	55.47	56.67	57.63	58.16	58.02	57.81	57.75	57.71	57.65	57.59	57.53
	消费占比	9.65	8.92	9.57	10.94	18.42	23.27	23.31	24.27	24.52	25.22	24.99
	GDP占比	9.66	9.30	9.91	11.47	21.80	26.68	26.55	27.55	27.98	28.49	28.6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2.3 中美贸易不平衡与再平衡调整

全球化的钟摆由此开始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内过度分工向大国核心产业链本土化摆动。造成全球产业链断裂的新冠肺炎疫情则成为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全球化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国则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生产（2010 和 2019 年 GDP 全球占比分别超过消费占比 3.16%和 3.77%）对应着美国消费（2010 和 2020 年消费全球占比分别超过 GDP 占比 3.23%和 3.20%）。中国以农民工的低福利低成本支撑制成品出口并积累美元债权，而美国则以美元霸权地位支撑并积累对外美元债务。中美贸易不平衡支撑的生产-消费角色平衡，对中美双方都具有不可持续的高风险性。如果美国的出口能力与海外积累的美元购买力间的差距日益放大，则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经济主体终将逃离美元体系，或发展双边平衡的易货贸易，或创造美元替代品（如虚拟货币或者地区性货币）。这意味着美国失业、财政脆弱性和社会分裂等问题加深，中国过去 40 余年积累的海外财富则面临巨大损失。因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倾向全面收缩，而拜登政府则以“小院高墙”策略维护其高科技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并以意识形态差异动员盟国围堵中国。

在此全球化调整期，中美面临的内部挑战却是相似的。都需要通过教育培训大力提升劳动者对产业结构调整适应能力。Gomory 等人认为，美国可增加研发投入和改进中小学教育质量以提高生产率。但远水不解近渴。更直接的措施是让美国一些高附加值企业享有低税率，以此鼓励企业将高附加值工作岗位迁回或留在美国^[9]。相比较，我们需要积极推进技能与技术的相互适应政策，处理好劳动替代和劳动互补型技术发展的节奏与关系，并对传统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技能培训，促进劳动力更顺畅地向消费服务业等成长可期的产业转移。

3 中国的战略应对与产业转型

3.1 全球结构矛盾的中国情景及其对产业转型的要求

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老龄化三类全球结构矛盾在中国表现突出。气候变化趋势及我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承诺意味着中国将进行长期的能源结构转型。中国能源消费内部高度依赖煤炭，外部高度依赖进口石油。而新能源的发展，既可降碳，又可避免战略资源受制于人；而且新能源的产出与国土规模成正比，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大国优势。但是能源转型显然会导致传统能源行业和使用传统能源的经济活动萎缩，导致经济增长下行和通胀高企，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的贫富分化较为严重，造成消费不振、市场收缩、经济下行和资产泡沫膨胀。人口结构问题表现为深度和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因此，要从消费需求与劳动和资本供给两个方面实施产业转型。老龄人口增多，将加速保健、医疗、养老需求的增长，并对生物医药、慢性病防治和养老服务业的规模扩张与个性化、人性化发展提出更多要求。而劳动力和储蓄的减少要求中国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推进生产体系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更精准地对接。相比较，少子化将对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造成压力。扭转少子化趋势除了需要政府通过政策调整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和女性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外，还要求学前教育、养育服务等消费服务业提高供给能力。另外，壮年劳动者技能与产业升级的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加剧。这对健全技能培训体系，调整高科技产业发展方向提出更高要求。劳动替代型技术发展应受到一定限制，而劳动互补型技术则应得到鼓励和补贴。

相比较而言，欧美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集团间的文明冲突也呈加剧态势。中美生产-消费角色相互依存格局的不可持续以及试图脱钩的摩擦也给全球增加了不确定性。特别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中美国动员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惊世骇俗之举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过度扩张的制造业产能输出到欧美，以换取美元

储备，就如一个有着壮劳力的农民家庭不把余粮用于养育更多子女，实现代际平衡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将余粮借给不打算偿还的“村霸”一样。在全球化退潮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大幅度上升。如何从为全球市场生产转向更好满足 14 亿本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客观需求？就给我从规模过度扩张的重资产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高科技、轻资产（消费服务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非常紧迫的时代要求。

为此，我国政府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2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框架

内循环为主体的核心在于提高产业或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应能力。当前经济现状的主要特征在于中低端领域供大于求；而中高端领域更多在于补短板，或应对“卡脖子”技术问题，或解决普遍的供不应求。因此，应对之策就是在刺激中低端消费需求的同时削减其过剩产能；在中高端领域精准施策，通过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打破技术瓶颈，并在消费服务业领域以体制、机制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扩大有效供给。

（1）需要通过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调整并释放私人消费需求。具体政策：①实施人口代际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生育，实施二胎补助；扩大义务教育年限并实现学前覆盖；提高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共同富裕”“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三次分配”等新政策，无疑是对症下药的。②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农村宅基地的跨地区流转，放松户籍制度，在人口导入城市更多提供公租房和社会公共服务，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及其进城子女的教育均等化。

（2）需要提高供给的适应能力及其效率。重在消除内部壁垒，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城市群与都市圈集聚效益等。而改善投资环境则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即简政放权，提供公共服务，以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在保护私人权益的同时防范商业欺诈。

3.3 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与路径

1) 淘汰制造业低端过剩产能

中国制造业产能相对于全球大变局下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而言是明显过剩的。制造业产能过剩源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机制。中央政府则通过压低汇率及出口补贴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以压低工业地价、降低劳动与环保成本的方式展开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致使产能过度扩张^[4]。因此，避免产能的过度扩张需要从中央与地方政府退出逐底竞争机制入手。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央

政府的逐底竞争政策正在逐步退出。人民币汇率自 2020 年以来持续升值可看成政策变化的重要趋势。地方政府逐底竞争政策也将随土地财政的退出而退出。

中央政府提出“3060”降碳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旧能源替代政策。这是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除了达成降碳直接目标外，还将通过提高经营成本的方式促进高碳产业去产能。

另外，加快行业内重组也有助于淘汰低端过剩产能。一是行业领先企业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市场化的并购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提高现有产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二是国有企业间行政性的合并除了提高经营效率外还有财政转移支付作用。若能在合并后促进集团内部的产业转型，通过员工技能培训，拓展社会事业或发展成长型服务业，则可解决产业升级和转型中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 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促进高科技产业平稳发展

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政府驱动的重要特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给出了政府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但是在一个体量超过整个欧盟、各级政府都扮演投资主体的场景中，与制造业投资类似的产业同构化与投资泡沫必然发生。另外，科研积累或专业预判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更多高科技投资项目的失败。

股票市场科创板的设立促进了风险资本对高科技产业的更多投入，并在吸引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归和创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即政府的立场在于帮助企业融资而非保护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特别是地方司法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欺诈行为盛行。这使得中国股市优胜劣汰的功能缺失，系统性风险高企，进而无法有效支持优秀企业做大做强。

因此，在借鉴欧美股票市场注册制，扩大股市融资和股票供给的同时，需要健全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3) 加快现代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和合理布局

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例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①。中国 6 亿人人均月收入仅 1 千人民币。中国内需不足和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长期未得到解决。乡村振兴很大程度上是建成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现代农业及其产业链形成和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这些产业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逻辑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是其题中应

^① 引自李迅雷，“消费偏弱的深层原因：结构性因素与传统价值观”，微信公众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2021 年 6 月 4 日。他在文中写道，相比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的消费率还是太低了，如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消费率基本在 75%~85%之间，全球平均消费率水平也在 75%左右，中国则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落后 20 个百分点以上。

有之义。在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可离土不离乡，在农产品加工产业、农村医疗保健养老、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服务业获得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

现代农业以及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其中闲置的宅基地面积远超城市住宅用地面积。因此，如果政府允许宅基地复耕并将由此置换的建设用地权利以地票方式随农民工进城流转，这将成为最优选择，而城市以地票获取的建设用地应仅限于福利房和社会设施建设。相比较而言，耕地制度改革需要遵循“使用权高度集中、收益权充分分散”的原则，耕地的集中使用及其潜在的规模效益有助于吸引人才、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而收益权充分分散才能确保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另外，可以探索含有可继承、不可转让优先股的股份合作制，以促进先进农业企业组织的发展。

4) 鼓励商业模式和劳动互补型技术创新，促进消费服务业发展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家庭总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69%，耐用品消费占10%，非耐用品消费占21%。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相似。由于开放度和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消费结构变化有加速的趋势，如果中国未来以20年时间走完美国以往30年的历程，作者预计，那么中国消费服务占比将从目前的50%左右增加到65%。其中医疗保健、旅游运动健身、教育文化娱乐、金融保险服务和养老服务需求都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消费服务业是即时供给（服务由从业者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非贸易产业，服务不能储存，只以劳动消耗的形式发生，因此，此类行业具有劳动及技能密集型特点，也是未来唯一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大类产业。另外，消费服务业具有人性化、个性化的特殊要求，并且具有纠纷高发的风险。消费服务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

因此，有必要放宽市场准入并加强执业和从业资格管理。以税收减免和贴息优惠等政策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更多将人力资源开发与劳务派遣相结合的优秀消费服务企业，由此既满足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个性化要求，又满足从业者在继续教育、劳动保护、人格尊严和组织归属感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健全从业资格、技能培训及等级证书的行业管理体系，提升消费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快速增加合格服务从业劳动者的供给。鼓励消费服务业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缓解服务劳动者的压力并提升其劳动生产率。改革现行的用工和休假制度，释放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 [1]潘英丽, 周兆平.美国的全球化陷阱、贸易争端诉求与中国的战略应对[J].国际经济评论, 2018 (6) :85-97+6.
- [2]Fort T C , Pierce J , Schott P K.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8, 32 (2): 47-72.
- [3]Gomory R, Baum W. Globalization: country and company interests in conflict[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9 (31) : 540-555.
- [4]陶然, 苏福兵. 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C]// 吴敬琏.比较,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